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49

2013 年 10 月 4 日

给友人新书写的一番话

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纪苏

纪苏案： 这篇文字，写的时候有些犹豫，怕其中对左翼的批评会给松民带来某种不便。我一直认为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，既有珍贵的遗产值得守护，更有沉痛的教训需要总结 — 因为它毕竟以失败告终。总结教训这件事，如果今天的左翼自己不做，就别怪袁腾飞他们灯火通明开 24 小时店了。我在文中说毛泽东在当时是“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最大的反省者 — 同时也是最大维护者”，马上就有左翼网友腾空而起，质问“毛主席是希特勒的最大维护者么？”真的，如果左翼这么多年只练就了扣帽子的猴急速度简称“猴速”的话，那么左翼的复兴真得等到猴年马月了。“国家社会主义”啥意思我看也没必要说了，就说点儿左右两极间的飞翔吧。9 月 10 日在某会上听一些老自然科学家们说他们从前被骗了，觉得毛千好万好；如今大彻大悟，发现他其实坏透了。我发言时说，科学家最讲实事求是精神，事实恐怕是：毛并没您当时觉着的那

么好，但也没您今天发现的这么坏。平心说，这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，他们的“两头真”属于一种值得同情的天真，因而他们的飞翔洁白而忧伤，就像一行受伤的天鹅。而其他在两极间翻飞的都是些什么鸟，就不好说了。有拿“主义”当食堂或粥棚的，有见右边梯子人满为患于是改登左边的，总之，不一而足。

松民此书将要付梓，¹ 让我在前面写几句话，感谢他的信任。近来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生活基本上就成了对着天花板浮想联翩，于是就想到了和松民的“关系史”。可我竟然想不起我们是怎么认识的，好像没什么具体的因由。虽无小的因由，却有大的因缘。喜欢文史的朋友，好以“道友”相称。我跟松民走在同一条道上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所以自自然然就认识了，不知不觉就成朋友了。

虽在同一条道上，松民毕竟年轻腿健，在一些重要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都走在我的前面。我有时会想象自己在松民他们的心目中一定是副迟迟艾艾、啰里啰嗦的落伍相。看来松民还不是这么看。也许他的看法跟我一样：同时代的两个人，只要都有朴素的正义感，都有正常的思考力，年龄上——即经历上——又没悬隔到一个青春期一个更年期，那么他们是会越走越近的。

松民是个左翼思想者和评论者，有同情弱者的左翼情感，有“阶级分析”的左翼视角。站这么个位置，取这么个角度，世界上的不少问题及其症结能看得明白。我常感叹他眼光如刀光，幸乎自己不在其刀起刃进的路线上。不过天下事很辩证，有你眼光独到之处，也就有你视物的盲区。左翼思想的最大盲区是左翼自身的弊端，包括上辈子的和这辈子的。松民是思想者而非传教士，我们私下有不少交流，知道他能够不以

¹ 郭松民：《电影的战术》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。

情感代替事实，对己方的弊端是有所反省的。他最服膺的毛泽东，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最大反省者——同时也是最大维护者。反省是一个把事实从感情剥离的过程，疼痛不会小于揭皮撕肉；反省还是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合过程，可不像帽子说换就换。这其中的痛楚艰难，我想细心的读者，是能够在松民的一些议论中体会到的。松民不是逢场作戏的人，在巨变中国的文化江湖中，他保持了难得的书生本色。

松民曾经是位战斗机驾驶员，有回跟他一起坐飞机颇觉安全系数倍增——甚至盼望飞行员临时出情况、好让身边小郭挺身而出的杂念都起了。我一直觉得他不驾着银燕在上帝跟前转悠，却拿着笔成天跟王佳芝、金陵十三钗之流周旋，简直比当年教授下放农村起猪圈还过分。不过，与其为松民的云转泥而惋惜，倒不如为文化评论多一射雕英雄而快慰。松民作为思想者谈电影谈电视谈建筑谈流行，依然有一种飞行员的高高在上和历历在目。例如他对“范跑跑”——现象——的追打，跟“俯冲扫射”似的，真令人神旺。松民飞到文化上空来，基本上是搞空袭，有时也进行空投。他的空袭命中率高、杀伤力大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倒是对他的空投，我有一些保留。例如前一向引起争论的学生拜师叩头仪式，我看了本书中他的文章，感觉有些言不由衷，王顾左右而言他了。我理解松民对同道援之以手的情义。但天下事自有公论，松民保持沉默可矣。序言本来不该装进这类“微词”，但该提醒而不提醒，算什么“道友”？

有一阵，松民常给我发短信，感叹时光易逝，水流花谢。有一夜，我们坐在一个半山坡上的亭子里谈诗，他说最喜欢宋人的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。那种清婉如歌、恍惚如梦的意境也是我的深爱。松民柔软的文人心性，跟他开歼击机的军旅出身、舌剑唇枪的公众形象反差不小。不过，这也没什么好诧异的，中国一代代读书人的人格，多是侠骨与柔肠的统一。

就毛泽东与“国家社会主义”答邱真网友²

先说说“国家社会主义”吧。简单说，就是中苏那样的体制。哪样呢？我在 2005 年的〈八集政论片《居安思危》观后〉中简单说到过：

中国历史至 1840 年陡然改道，被迫并入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，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由此发生根本转变。能否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等级~竞争体系中死地求生乃至后来居上，便成为一切政党、制度、路线、政策、理论、文化、人格、审美等等的首要试金石。在这一点上，中俄两国的经历如出一辙。两国都是扶着社会主义~共产主义的旗杆，从民族危亡的险境中爬起身来；都是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森严壁垒，抗衡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；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，在工业化道路上昼夜兼程；后来，又都因集权体制的积重难返而逐渐丧失活力，陷入深刻的危机；最后，又都在危机中左突右冲，改弦易辙，经历了山河巨变。

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跟德国的纳粹体制有相似之处但并非一事，虽然有些人认为就是一回事，虽然纳粹党也这么叫过或被这么翻译过——汪兆铭也叫过“精卫”呢。

至于毛的不满于这种体制但又维护这种体制，我 2012 年在〈白没白活的青青岁月？——看电视剧《知青》〉中也说到过：

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始于文革由盛转衰的 1968 年底。那一年，文化大革命陷入了泥潭：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之后，彼

² 上文发表后，引起一些争议，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“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最大的反省者——同时也是最大维护者’？愿闻其详。”我遂作此回复。——笔者注。

此间的大打出手向着真枪实弹步步升级，清亡后近40年国家分裂、社会动荡的局面隐然再现。对此，毛泽东从最大的造反派泫然转身为最大的当权派，派出了军队这个尚未被“砸烂”的国家机器去恢复国家秩序。而曾经被赋予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重任的造反青年，也随之变身为“知识青年”，前往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。

其实通观新中国近30年的历史，毛充满了这种造反派/当权派、或反思者/维护者的矛盾。他的晚年思想之所以极富张力，其重要原因也正是在这里。毛曾对戚本禹等“年轻人”讲过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如果搞不好就会变成法西斯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，与其那样，我们还不如要英美民主呢。这样的反思，今天那些光扎堆儿不读书的“左”派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，想到也难以面对吧。毛就是毛，与挂他像章背他语录的众人有天壤之别。他希望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，希望群众创造历史，结果创造出的却是无数应声虫。这说来也是他、以及他想超越又无法超越的那个体制的失败和教训。我2006年在《中国革命和阴谋史学》中也感慨过：

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经九曲九折，一雪百年屈辱，崛起于世界的东方；他后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探讨，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。这样一位开天辟地又掀翻天地的人物，无论功过，都属于不世出的巨人。只是，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，他并没有大过他的时代，也无须笼罩不属于他的历史。丑化毛固然可鄙，重新神化他也不可取。无论是用毛时代的失败掩饰今天的失败，还是用今天的苦难抵消毛时代的苦难，两种异曲同工的态度都不能持之久远。他的全部遗产包括成败得失，都应成为今天我们强身免疫的补品，成为我们面对现实问题、探讨未来道路的参照。但营养而

已，参照而已，毛的理论与实践毕竟是他那个时代许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。把老路标重新树立起来，能否将酒吧一条街还原为工农大道，天算非我所知，人算则以为不能。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在古希腊时代都不容易，今天就更难了。对于重新出发的社会正义，毛不必是当头的红日了，人民群众的旗帜应是人民群众自己。其实，毛的精神最夺目之处，恰恰是为了源头通浚、活水长流而敢教天大的主义退居二线。毛的真正传人，或真正呼吸到他灵魂的人，应具有超越他的志气。